

荆州学派与易学

——以刘表易学思想的考察为中心

吴成国

提 要 荆州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与刘表息息相关,在汉末三国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在刘表的治理下,荆州安定、富庶的环境使得大量人才聚集,在刘表的发起和带动下,最终形成了以讲《易》为主的荆州学派;刘表的易学思想既可从其所撰《周易章句》中看出,也体现在其治理荆州的实践中;作为一个当时在湖北荆州地区形成而名震全国的学派,荆州学派对汉代学术的传承,对江东、巴蜀地区思想学术的影响以及对王弼玄学的形成都具有极大的意义。

关键词 荆州学派 刘表 易学

汉末三国时期,在荆州首府襄阳出现了以古文经学为主体的与今文经学派相对抗的新的哲学思想流派——荆州学派。由于易学是汉末经学之主流,荆州学派是以讲《易》为主的学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刘表、宋忠、蔡母闾、司马徽等,其中刘表是该学派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宋忠则是具体的组织者。荆州学派作为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链环已为学者们所重视,本文以刘表的易学思想为考察中心,对荆州学派与易学试作探讨。

一 荆州学派的形成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原荆州刺史王叡被孙坚所杀,朝廷诏令刘表担任荆州刺史。时荆州局势如天下大势一样,政权瓦解,混乱不堪,境内各地太守长令阻兵作乱,强宗大族聚众自保。荆州刺史治所在武陵汉寿(今湖南常德东北),刘表行至宜城,前进的道路就已阻塞不通,只得单枪匹马进入宜城,依靠当地大族蒯良、蒯越、蔡瑁、庞季等铲除各部宗帅,收编余部,移治襄阳。至建安三年(198),刘表遂在荆州建立了如《后汉书·刘表传》所说“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新政权。

刘表治下的荆州,政局和社会安定,经济富庶,是荆州学术文化勃然兴起的重要前提。加之作为名士的刘表政治上几无进取之心,时人说他“岂拨乱之主”、①“非霸王之才”,②他自己也表示“保江汉间,观天下变”。③正是刘表政治上的不思进取,助长了他学术文化上的抱负,终于成就了历史上的荆州学派。

① [晋]陈寿《三国志·杜袭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65页。

② [晋]陈寿《三国志·裴潜传》,第671页。

③ [晋]陈寿《三国志·刘表传》,第212页。

大量人才聚集荆州是荆州学派兴起的基本条件。《三国志·刘馥传》注引《晋诸公赞》说“天下虽乱,荆州安全。”荆州成为四方士人躲避战乱的理想寄居地,于是慕名而来的儒生名士如过江之鲫,仅“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①这些寄居在荆州的士人,均非等闲之辈,《三国志·王粲传》称“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知名于当时,盛传于后世者如:宋忠、谢该、颍容、贾诩、王粲、司马徽、诸葛玄、诸葛亮、徐庶、崔州平、孟建、石韬、和洽、杜袭、繁钦、赵俨、裴潜、司马芝、伊籍、杜夔、李譔、尹默等。刘表身边,荆州境内,一时名士云集,英杰荟萃!数以千计的儒生名士聚集在荆州,标志着“荆州代替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②

身为名士儒生的刘表,不仅是荆州学派的发起人,而且还是荆州学术文化的领导者。他精心组织荆州本土名士和外来儒生开展大规模的学术文化活动:开立学官,博求儒士讲学;删划浮辞,改定五经章句;广搜遗书,典籍充于州间。

开立学官,博求儒士讲学。建安三年(198)刘表平定张羡,开土遂广,起立学校,开立学官。《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云:“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纂毋闾、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刘表设置的州学中,讲授的儒士即达300余人,据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载:“乃命五业从事宋衷(亦作宋忠)所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纂毋闾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余人。于是童幼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接踵,川逝泉涌,亘亘如也,兢兢如也。”^③在州学就学的生徒达千余人,《刘镇南碑》载:“笃志好学,吏子弟、受禄之徒,盖以千计。洪生巨儒,朝夕讲诲,闾闾如也。虽洙泗之间,学者所集,方之蔑如也。”^④若将荆州州学与洛阳太学进行比较,诚如史家所言:“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校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⑤有300余名洪生巨儒朝夕讲诲的荆州州学,是效法洛阳太学而设置的,也是全国唯一的官学。

删划浮辞,改定五经章句。《刘镇南碑》记刘表“深愍末学远本离实,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划浮辞,芟除烦重,赞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几者多。”这实际上是说刘表集合众多儒生编订简明经学教材,名为《五经章句后定》,主要是删除那些被认为不切要的所谓“浮辞”,使学者能在较短时间内通晓经义。《隋书·经籍志》载,刘表本人亦有著述,隋代还有刘表所作《周易章句》五卷、《新定礼》一卷。宋忠,字仲子,南阳章陵(今湖北枣阳)人,《五经章句后定》的具体组织者,梁时还有他的《周易注》十卷流传,隋时已亡佚。清人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认为,“新定即后定,题小异耳”,^⑥则知刘表《新定礼》一卷也是作于荆州刺史任上,所谓“后定”之学,正是荆州学派的学术成果。史家认为,《五经章句后定》是第一次集体写作的综合性五经教本,也是古文经学第一次引入官学。

广搜遗书,典籍充于州间。《刘镇南碑》云:“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

① [宋]范曄《后汉书·刘表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21页。

② 唐长孺《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③ [清]严可均辑,许振生审订:《全后汉文》卷91,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21页。

④ [清]严可均辑,许振生审订:《全三国文》卷56,第572页。

⑤ 唐长孺《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第3页。

⑥ 卢弼《三国志集解》卷6《刘表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7页。

典毕集,充于州闾。”刘表这一活动,不仅有益于当时荆州学派的学术文化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大有裨益。时北方经董卓之乱,京都洛阳官府藏书多毁于战火,《隋书·经籍志》说“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其它地区的图书也都饱受兵火之害,相比较而言,荆州既无天灾,又无人祸,众多流寓荆州的士人携带而来的书籍得以保存。经刘表广泛搜集,荆州官府藏书一时成为全国之冠。刘表死后,其子刘琮降附曹操,襄阳未遭破坏,赤壁战后,曹操也未丢失襄阳,想必荆州的这些藏书会运到北方而被重新保存和加以利用,当与此有关。

正如论者所言,“刘表精心组织实施的上述活动,不仅使荆州的文教事业迅速地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而且直接促成了荆州学派的形成,从而使荆州的学术广泛传播,对当时其它地区乃至后世的学术文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①

二 刘表的《周易章句》

从荆州学派的形成看,刘表是这一学派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他不仅亲自给州学的儒生授课,而且还著书立说,《隋书·经籍志》载有刘表撰《周易章句》五卷。探讨刘表的易学思想,首先得从《周易章句》说起。

刘表(142—208),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是刘汉皇室的后裔。他少年时代曾随同郡经学家王畅求学,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刘表成长之时,正值东汉王朝政治衰败的末世。当时皇权腐败,士大夫集团与宦官势力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在这一斗争风潮中,刘表表现得相当活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被人们看成士大夫阶层的重要代表人物,誉为“八俊”之一。^②刘表任荆州牧期间,使荆州成为汉末动荡社会中的一块净土,众多文士荟萃此地,并于此形成了荆州学派。

《周易》这部典籍,在两汉的传承分成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支。《隋书·经籍志一·经志》曰:

汉初,传《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宽,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雠、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学。又有东郡京房,白云受《易》于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尝立,后罢。后汉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并立,而传者甚众。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兰陵田将永。故有费氏之学,行于人间,而未得立。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

从这段记载知,汉代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所传《易》,立于学官,代表的是西汉官方易学的发展,属于今文经学系统;费直、高相为代表的费氏易,未被立于学官,属于民间易学,属古文经学系统。前者对经典的解释,倾向以天人感应等神秘主义解释儒家经典;后者则相反,费氏易不讲卦气说及阴阳灾变,讲求文意解经,注重义理。

荆州学派是以讲《易》为主的学派,刘表注《易》传授费氏易,属于古文经学系统。由

^① 刘玉堂、陈绍辉《刘表与汉末荆州学术文化》,《江汉论坛》2001年第4期。

^② 《三国志·刘表传》。另,裴注注引张璠《汉纪》谓为“八交”或“八顾”;注引《汉末名士录》谓为“八友”。而《后汉书·刘表传》则记为“八顾”。

于“易学关于天道,辅之以《太玄》,在汉末最为流行”,^①易学是汉末经学之主流,所以“荆州之学是汉末三国时在湖北荆州地区形成的一个讲《易》的地方学派”。^②古文《易》的创始人费直,其解经“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③即以《易传》文意解经。东汉马融、郑玄不少经学大师都习古文《易》。尽管刘表的《周易章句》不复存在,但清人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一引张惠言《易义别录》云:“景升章句阙略,难考。案:其义于郑为近,大要费氏易也。”^④

虽然《周易章句》早已亡佚,但我们今天却能从唐人李鼎祚撰写的《周易集解》中找到关于刘表《周易章句》的两条记载。下面逐一分析这两条记载。

其一,《周易集解》卷四“《象》曰:地中有山,谦。刘表曰:‘地中有山,以高下下,故曰谦。谦之为道,降已升人。山本地上,今居地中,亦降体之义,故为谦象也。’”^⑤其意思是《象辞》说:看来低平的大地中都包含着高山,这就是《谦》卦的象征。刘表的注告诉人们:高耸的山原本在地上,现在却潜入地下,正如一个有才的人含藏优点而不去张扬。

为了明白《谦》卦及刘表章句的意思,我们逐一罗列郑玄和其他注家的解说:

郑玄的注解。宋王应麟辑、清惠栋考补《增补郑氏周易》卷上曰:“谦:亨。君子有终。艮为山,坤为地,山体高,今在地下,其于人道高,能下下,谦之象。亨者,嘉会之礼,以谦为主,谦者自贬损以下人。唯艮之坚固,坤之厚顺,乃能终之,故君子之人有终也。君子以撝多益寡,撝,取也。卑以自牧也,牧,养也。”^⑥

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曰:“艮山居坤地之中,是‘以高下下’,故名为谦。‘谦之为道,降已升人’,即《曲礼》所谓‘礼者,自卑而尊人’之意也。‘山本地上,今居地中’,合乎贵而能降之义,故其象为谦也。”李疏又说:“礼有定分,分不可干,故‘上天下泽’则为履。礼有内心,心不可亢,故‘地中有山’则为谦。”^⑦

今人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说:“《谦》之外卦为坤,内卦为艮。坤为地,艮为山。然则《谦》之卦象是‘地中有山’。地卑而山高,地中有山是内高而外卑。谦者,才高而不自许,德高而不自矜,功高而不自居,名高而不自誉,位高而不自傲,内高而外卑,是以卦名曰《谦》。按《象传》又以地比庶民,以山比贵族,以地中有山比广大庶民中间有少数贵族。贵族财多,庶民财寡或无财,此乃不平之现象。君子观此卦象,从而撝取其财多者以益其财寡与无财者,称量其财物之多寡,以定其公平之施予。”^⑧

由上可知,刘表的注释和郑玄一样,都是采取形象思维的方式进行解读的。费氏《易》由马融作传,郑玄作注,“郑玄注《易》,采用互卦(即由内外两卦交互组成的新卦象)、消息(即为卦中阴阳消长变化)推求卦象外,还采用‘爻辰’(以《乾》《坤》两卦十二爻、

① 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5页。

② 张运华《荆州之学与魏晋玄学》,《湘潭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③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费直传》,第3602页。

④ 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二十五史补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106页。

⑤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3页。

⑥ 《四库全书》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

⑦ [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96页。

⑧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179—180页。

二十八星宿及四方五行、卦气、十二属象等相值解释卦爻辞的由来)’说”^①。《谦》卦卦象是由八卦内外不同的两卦所组成的,故经学家使用两个不同的卦象含义来进行解释,用山内高外卑形象来比喻谦逊使人才高而不自傲,从而引出它所表达的深刻内涵。

其二,《周易集解》卷六“《象》曰:山下有雷,颐。刘表曰:‘山止于上,雷动于下,颐之象也。’”^②其意思是:《象辞》说:春雷在山下震动,草木萌生,这就是《颐》的象征。刘表告诉人们:雷在山下震动,使山上的植物得以发芽滋长,遂有养育之功。从《颐》的卦象看来,震为动,艮为止,人们行动要适可而止。

《周易·序卦》曰:“物蓄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③郑玄的注见于宋王应麟编《周易郑康成注》:“颐者,口车辅之名也。震,动于下;艮,止于上。口车动而上,因辅嚼物以养人,故谓之颐。颐,养也。能行养,则其干事,故吉矣。二五离爻,皆得中离为目观象也。观颐,观其养贤与不肖也。颐中有物者,口实自二至五有二坤,坤载养物,而人所食之物皆存焉。观其求可食之物,则贪廉之情可别也。”^④不难看出,“郑玄以《震》卦与《艮》卦之间相互关系的象征意义来解说《颐》卦的象征意义,从而拓展了《周易》形象思维的疆域,大大增强了以《周易》说明世界万物及其发展变化的功能,从而把《周易》的形象思维又向前推进了一步”。^⑤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曰:“山止于上,雷动于下。颐之为用,下动上止,故曰:‘山下有雷,颐。’”^⑥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曰:“上止下动,其象为颐。又雷伏山下,天地以阳养物,故曰颐。”^⑦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则说:“《颐》之上卦为艮,下卦为震。艮为山,震为雷。然则《颐》之卦象是‘山下有雷’。山下有雷,是天暖之时,是天地养万物之时,是以卦名曰《颐》。按《象传》又以山比贵族,以雷比刑,以山下有雷比贵族在上位施刑罚于下。君子观此卦象及卦名,从而慎言语,节饮食,以免因失言多欲遭受贵族之刑罚,此乃养德保身之道也。”^⑧

关于《颐》卦的注解,“刘表的注释和郑玄一样,用事物之间的关系引发出其他种种现象,从而赋予了《易经》卦象更为深刻的蕴义”。^⑨

宋忠《周易注》的易学思想,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荆州学派发起人和领导者刘表的易学思想。荆州学派的具体组织者宋忠,在刘表的领导下,除与蔡母闾一起主持《五经章句后定》一书外,还撰有《周易注》十卷。在荆州学派里,不论是编订《后定》还是注《周易》,宋忠都应秉承刘表的旨意,贯彻刘表的思想学术意图。宋忠《周易注》亦亡佚,

① 余鹏飞《刘表易学思想浅探》,《襄樊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②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第142页。

③ 《周易·序卦》,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第96页。

④ 《四库全书》第7册,第135页。

⑤ 余鹏飞《刘表易学思想浅探》,《襄樊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⑥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3,第41页。

⑦ [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第285页。

⑧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260页。

⑨ 余鹏飞《刘表易学思想浅探》,《襄樊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但李鼎祚《周易集解》却辑录了宋《注》45 条,其中既有《经》注,也有《传》注。有论者指出“宋忠以名物训诂和辨章学术为重点,竭力剔除卦象说中阴阳灾异神说成分,在突出象数的基础上,也兼及义理,恢复了以易解易的传统。宋忠解易和郑玄一样特重卦爻象所象征的某类或某种物象,……宋忠的易注标志着义理派易学的开始崛起,并逐渐走向基本成熟。”^①

由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所记刘表《周易章句》的上述两条材料和宋忠《周易注》,我们可以对刘表《周易章句》作出合乎逻辑的判断:

第一,刘表《周易章句》是对郑氏、费氏易学的继承和发展。就此一方面言,清人张惠言《易义别录》称“其义于郑为近,大要费氏易也”的结论可谓至论。

第二,刘表《周易章句》的特点。唐长孺先生说“《周易章句》和《新定礼》均由刘表署名,说明全书由刘表以荆州牧身份主编,今古文的抉择,解释的异同,应由刘表裁决。”^②王晓毅先生称“从经学的发展看,荆州经学堪称汉魏之际官方经学由今文经变为古文经的转折点,使古文经第一次合法立于官学,并使删繁就简、重视义理的学术风气进一步发展。”^③余鹏飞先生的研究结论甚为精当:“刘表解易,注重义理,略于象数,以文字简明为其特色。刘表所倡导的荆州学派的特点是,发扬道家破事象探玄理的传统,运用寄言出意的方法论,将儒家经典作为一种凭借,不拘守章句训诂,文字阐述也不重前人的看法,重点是发扬作者自身的思想。”^④

三 刘表荆州刺史任上的易学思想实践

《周易》作为一部与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个人命运发生广泛联系的经典,其社会功能犹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学,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刘表作为汉末传授费氏易的一名儒士和官员,其易学思想不仅表现在他的《周易章句》中,还表现在他在荆州刺史任上的易学思想实践上。

首先,刘表政治上几无进取之心,助长其学术文化上的抱负,创建和领导荆州学派,是《周易》“变易”思想的最好体现。

汉末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动荡、战乱频仍的时期,用时人王粲的话来说“当此之时,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⑤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是这一分崩离析时期的开端。与刘表据有荆州之时,袁绍据有冀州(今河北),曹操占领兖州(今山东中部),袁术先据南阳,后据扬州(今安徽),孙坚据豫州(今河南),公孙瓒据幽州(今河北北部),陶谦割据徐州(今山东南部),田楷领青州(今山东北部)。这是刘表出任荆州刺史时的天下大势。

面对东汉末年之变局,刘表自初平元年(190)出镇荆州,到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

① 余鹏飞《从〈周易注〉看宋忠的易学思想(上)》,《襄樊学院学报》2009年第12期。

② 唐长孺《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第4页。

③ 王晓毅《荆州官学与三国思想文化》,《孔子研究》,1994年第1期。

④ 余鹏飞《刘表易学思想浅探》,《襄樊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⑤ 《三国志·王粲传》注引《文士传》,第598页。

征,专制荆州达19年之久。崇尚中庸之道的刘表“理兵襄阳,以观时变”,^①采取了“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的策略,^②没有象中原地区的割据者一样出兵征讨,扩大地盘,而是重视文教,擅长儒术,使荆州成为汉末著名的学术文化中心,在创建和领导荆州学派中实践《易》之变易思想。因为《周易》之“易”包括“简易”、“变易”、“不易”三层含义,而主要义为“变易”,^③《周易》主要是讲“变易”的典籍。《周易》的“经”与“传”都充满变化的观念,其《系辞》更直接言“变”——“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变化者,进退之象也”;“一阖一辟谓之变”;“天地变化,圣人效之”。^④故《史记》在论及六经功用时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⑤

“刘表缺乏政治家和军事家应有的素质,这使他的割据成了消极的固守一隅”,“同新一代英雄人物相比,刘表难以适应当时混乱的时局”,^⑥历史上虽然少了一名政治家和军事家,但荆州学派及其易学却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链环。

其次,刘表荆州刺史任上的所作所为实践的是《周易》的思想与主张。“刘表的易学思想不仅表现在他的《周易章句》中,还可从他在担任荆州刺史的十九年过程中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中看得出来。”^⑦

刘表称得上是乱世的文官,而且是一位不错的地方官员。刘表“在荆州几二十年,家无余积”,^⑧表明他首先是一名清廉的官员。因为他深知“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乾·上天》),“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象》),“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习坎·象》),他更懂得“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否·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坤·文言》)。

刘表也称得上是颇有政绩的地方官。在他的任上,荆州不但建成“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新政权,^⑨而且“沃野万里,士民殷富”,成为“帝王之资”;^⑩刘表爱民乐士,仅关中“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⑪“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⑫他发展地方经济,推行儒家的“德政”、“仁政”。因为刘表“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易·履·象》),“君子以立不易方”(《恒·象》),“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离·象》),“以贵下贱,大得民”(《屯·象》),“君子以容民畜众”(《师·象》),“劳谦君子,万民服也”(《谦·象》)。

刘表还是一位至晚年前长时间尊崇朝廷的地方割据势力官员。他据守江汉,维系朝

① 《后汉书·刘表传》,第2420页。

② 《三国志·刘表传》注引《汉晋春秋》,第212页。

③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74页。

④ 《周易·系辞》,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卷7,第76、82页。

⑤ [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7页。

⑥ 王永平《刘表新论》,《江汉论坛》,1995年第6期。

⑦ 余鹏飞《刘表易学思想浅探》,《襄樊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⑧ 《后汉书·刘表传》,第2423页。

⑨ 《后汉书·刘表传》,第2421页。

⑩ 《三国志·鲁肃传》,第1269页。

⑪ 《三国志·卫凯传》,第610页。

⑫ 《后汉书·刘表传》,第2421页。

廷,对荆州以外地区从未进行过扩张,正如裴松之在《三国志·臧洪传》中案语所言:“(刘)表保据江、汉,身未尝出境。”^①这就是《易经》中所说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乾·彖》)。刘表对日益衰落的东汉朝廷坚持保持联系,做到“内不失贡职”^②,是因为他深深懂得《周易》中所说的“或从王事,知光大也”,“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坤·象》)的深刻含义。

四 荆州学派易学研究之地位

关于荆州学派特别是其易学研究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地位,前辈学者已有较丰硕的研究成果,有的研究结论实属不刊之论。以下三端尤其值得注意:

1. 对汉代学术的传承作用。荆州学派以讲《易》为主,但也并不忽视其它经书,编订《五经章句后定》,“可见荆州学派学术内容主体依然是两汉以来的五经之学,只是五经之中偏重《易》,荆州学派学术内容体现了五经学说之传统和该时代《易》学之流尚的结合”。^③也有论者指出“在当时长期的战乱中,荆州官学作为一个稳定的学术中心,对汉末思想解放运动之文化成果的进一步发展,起了薪尽火传的作用。”^④

2. 对江东、巴蜀地区思想学术的影响。清代史学家周寿昌谓“后人谓汉儒文学盛于西北,自晋人渡江之后,东南人才始盛,据此,则景升实启其端。”^⑤何启民言“当汉献帝建安初年,中国本土的经学,……而大江以南,远及江东巴蜀,并从荆州。”^⑥王晓毅说:荆州官学“萌发着新的学风,培养着新一代学子,并不断与周边地区进行着频繁的学术交流,最终分别融入三国文化的发展之中。”^⑦

3. 对王弼玄学形成的意义。玄学是我国中古时期一个重要的哲学派别,它的学术承继与汉末三国时讲《易》的荆州学派密切相关,对此,汤用彤先生指出“我们回溯魏晋思潮的源头,当然要从汉末三国时荆州一派易学……说起。”^⑧荆州学派作为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链环,决不可忽视,因为“从思想史的学术承借与学派演化方面而言,此一移易运动,确是魏晋玄学所以发生的源泉之一”。^⑨

可以说,荆州学派是汉末三国时期在湖北荆州地区形成而名震全国的学派。惜刘表歿后,荆州的学术文化骤然衰落,荆州的学术文化中心地位就此丧失,其后数百年未能复兴,取而代之的是荆州的军事战略地位。

(作者通讯地址:吴成国 武汉 湖北大学荆楚文化研究中心 430062)

(责任编辑 晓 思)

① 《三国志·臧洪传》,第232页。

② 《三国志·刘表传》注引《汉晋春秋》,第212页。

③ 金仁义《刘表与荆州学派》,《池州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

④ 王晓毅《荆州官学与三国思想文化》,《孔子研究》,1994年第1期。

⑤ 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页。

⑥ 何启民《魏晋思想与谈风》,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38页。

⑦ 王晓毅《荆州官学与三国思想文化》,《孔子研究》,1994年第1期。

⑧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1页。

⑨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6页。